

一位跟自己过不去的作家

——小说集《理想国》的创作特点

鲁顺民



《理想国》书影

杨遥的新作《理想国》(作家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),大致是2019年以来写的中短篇小说合集,体现着作者的坚守与执着、探索与实验。

杨遥小说的叙述控制从一开始就显现出突出的个性,我在文本意义上给他总结为“去训诫化”写作。因为杨遥是大学中文系出身的作家,受过严格而完整的教科书式文学训练。但奇怪的是,他的小说,他小说的叙述控制,学院里《文学概论》式教谕几乎无迹可寻,标准的中短篇小说情节演进原则被一再规避,人物性格更趋向于自我经验表达,等等诸般。这些特点,在初开始写作的作者那里,倾诉欲望大于快意讲述,个人情绪高过文学色彩,还属于自发写作状态,没有“训诫”痕迹,并不鲜见,只是坚持不了多久。杨遥不同,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相当的自觉和刻意,他小说叙述控制的特点,显然来自对小说本身的思考与探索,并且一直坚持下来。他的叙述控制所体现出来的对某种排拒、规避、摒弃,甚至冒犯、背叛、反抗的意味是非常明确的。与其说,杨遥在挑战“训诫”式文学理念,毋宁说他在不断与自己已经成型的过往进行切割与告别,毋宁说他就是一位不停跟自己作对跟自己过不去的作家。所以很多年来,每阅读杨遥的小说,总是提心吊胆,担心推开许多现成的东西,前往陌生之处,小说会是什么样子。

从技术层面讲,“去训诫化”的结果,少了羁绊,少了约束,甚至连读者的反应都不去顾及,小说文本反而更加纯粹,叙述更加紧密和结实。他不事铺陈,不事盐碱醋酸的交代,甚至结构上也绝少过渡,一个情节前往另一个情节,缝隙明显,没有粘连,连一句废话都没有,甚至连传统的人物描写也是寥寥几笔,还要看对小说氛围与情绪有无益处

或起什么作用。笔触前往小说展开的地方,迫不及待。所以,呈现给读者的小说文本,现场感极其强烈,富有冲击力的画面与场景,将小说最初构思的各种想法,小说人物所要表达的意蕴都填充到丰盈而简捷的细节里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“去训诫化”的结果,使得杨遥所有的小说都畅达而简捷、尖锐而果断,获得意想不到的创作自由与快感。这是杨遥小说在艺术上有别于同代作家的地方。

《理想国》所收18部中短篇小说,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、三大板块。

《黑色伞》《未来之路》《炽热的血》等,基本上是作家对少年小镇记忆的整理与梳理,属于第一个板块。《和邹正方的渊源》《七截儿》《鲤鱼尾》等,可视作作家由乡到城数十年生活积累的集中呈现,属于第二个板块。而《理想国》《把自己折叠起来》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3篇,再加上《白色毡鞋》,可视为作家试图“有所为”的某种尝试,属于第三个板块,相对于作者有意回避宏大叙事,执着于个人经验和内心真实体验小说风格而言,显得比较特别。

《白色毡鞋》把老鞋匠对古老匠艺的礼敬和对往昔的思恋表现得令人心动,同时,也点明作者的构思初衷,即对古老传统的礼敬与缅怀。

这篇《白色毡鞋》,杨遥一如既往延续着中短篇小说的叙述控制路数,冷静、克制,但显然,作家对时代的大背景思考更多一些,叙述的空间也因此更加广阔,作家希望自己的小说承载更多东西。杨遥自己也认识到,长期“去训诫化”的写作路子,会出现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,比方,在构思、叙述、结构和人物塑造上会出现重复自己的现象。所以,如何突破自己、如何既坚守自己的理念,又在文本上有所创新,杨遥一直不断探索,不偏离他小说创作的路子,且要“有所为”。但这样一来,以《白色毡鞋》为标志,这类小说很容易被贴标签式地去理解和解读。《白色毡鞋》表现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,《理想国》《大鱼》乃书写全民抗疫,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是脱贫攻坚的图解。诸般。这种解读和理解对不对?当然没有错,可是,一篇小说一旦被贴上某种

标签,它的文学韵味会顿时缩水不少。

作为跟踪他20年小说创作的编辑,在读到第三类作品的时候,多少有些担心,而且作品也确实呈现出标签化构思的倾向,某些地方读着有些僵硬、直白。其实,就小说文本进行分析,会发现,当他要将某些“有所为”的元素加入小说的时候,显得有些刻意。在“去训诫化”写作控制中,杨遥小说就情节和细节而言,是缜密的、结实的、日常的,文学虚构与想象的质感因此而特别突出。但当他有意要加入某些元素的时候,突然会改变小说的走向,使得虚构与想象的可能性变得特别确定。这是小说读着僵硬和直白的主要原因。比方《白色毡鞋》,温州鞋匠进入小镇,对老鞋匠的传统匠艺与生存构成挑战,从此后的情节演进来看,这一矛盾完全可以用不露痕迹不动声色的方式加以处理,但他在构思的时候,刻意加进一段斗殴的桥段,让小说的演进突然出现塌陷,事件演进被推到前台,人物塑造退居其次,本来厚重的小说主体,顿时薄了许多。在《父亲和我的时代》里,也有这样的弊端存在。

这样的塌陷在杨遥的诸篇小说中其实并不多,且是短篇小说里的情节处理的一些缺憾,究其原因,“去训诫化”成就了杨遥,但毫无疑问是短板。杨遥在写作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这个短板的存在,《理想国》《大鱼》两篇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,浑然天成,可圈可点,成为杨遥中短篇小说创作富有标志意义的力作和精品。

《理想国》这部中篇小说,本来小说中每一个人物陆续出场,已经构成一幅疫情特殊时期各阶层人物生存状态的众生相,足够复杂,足够饱满。但作者并不甘于如此,或者说,作者并不着意表现疫情,笔墨一宕,疫情结束,作者花大量笔墨虚构了一场行为艺术表演。

这部中篇小说的高明之处,就在于最后的虚构,作者的文学想象力与构思能力也发挥到了极致,使得小说具有了某种超越意义,超越了最初构思的“有所为”,恰恰呈现出“去训诫化”叙述控制的本色,或者说是“去训诫化”写作理念的某种深化与突破。

双塔



宏阔再现乡村变革

李志荣

无论如何,辽阔而厚重的大地是文学绕不开的话题。在社会变革时期,那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,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,他们怀揣梦想,突破自我,破茧成蝶,为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,坚韧不拔,成为时代的弄潮儿。柳青的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正是反映那个时代,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民为追求梦想而奋斗的历史画卷。时隔半个多世纪,我们还可以从其中窥视到那个时期乡村的嬗变。

渭河以南关中平原的一个村庄,有位农民叫梁三,恪守本分,浑身是力气,由于生活变故成为单身,他在逃难的灾民中找到人生的另一半,组成一个特殊的家庭。他竭尽全力,受尽苦难,累弯了腰,想让妻子和孩子过上幸福生活,可是到了50多岁,他的孩子梁生宝都长大了,日子依然过得惶惶不堪,饥寒交迫,庄稼人的出路在哪里?

梁生宝长大后,赶上一个社会巨变的时代,他与父亲不一样,他的眼光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庭,而是投向了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道路。任何新事物的出现总会遇到重重阻力,不理解者、阻挠者、看热闹者,各种人物都有。梁生宝组建的蛤蟆滩互助组就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。遥想那个年代,由一群穷人组织起来的互助组,一穷二白,缺乏基本生产资料,甚至面临着春荒,他们如何改变命运、改变乡村?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乡村一群人的艰苦奋斗和心路历程。

梁生宝在社会变革来临之际,义无反顾地投入洪流之中,办起互助组,朝着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前进。其实,今天没必要对于那个时代进行过度解读,说到底不过是农民想多打粮食过好日子,哪有那么多的诠释和高深?梁生宝组建互助组充满了坎坷,首先来自父辈的反对。梁三作为本分的庄稼人看不惯梁生宝经常开会,在他的心目中庄稼人要守在土地上,整日胡跑乱窜能种好地吗?其次是老党员郭振山的阻挠。郭振山在村里威望高、资格老,可是在乡村发生变革时落伍了。他家里人口多,生存压力大,当互助组这个新生事物出现时,他怕吃亏、怕耽误农业,本能地拒绝,在他身上反映了小农经济思想。同时,还有富农的反对和中农的不配合。梁生宝作为关中平原的汉子肯肯认输?他在乡村领导的支持下,以坚定的信念、无所畏惧的勇气,攻克了前进道路上一个一个障碍。他一心为公,乐于吃苦,勤俭节约,成为那个时代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典范。

小说塑造了一群乡村人物,生动形象,细腻深刻。除了梁生宝等人之外,还有富农姚世杰、富裕中农郭世富、梁生宝母亲、徐改霞、秀兰、王直二杠等等。姚世杰是乡村里的能人,懂得人情世故,破坏合作化;郭世富家里原来贫穷,种庄稼是个行家里手,从租种土地开始起步,盖起大瓦房。一旦渡过艰难后,面对农村的社会变革,极力抵制。小说把他的精打细算、自私自利,刻画得惟妙惟肖。其实,他们只是不接受而已。回头看来他们也是勤劳善良的农民啊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柳青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中,我们还看到数千年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,欣赏到工业化还没有与农耕文明碰撞时一幅幅美丽的农耕图,品味到农民对于土地的深厚感情。小说生动而形象地绘制了当时的农村场景:一望无际绿油油的庄稼地、收获季节人欢马叫的场面、鸡犬之声相闻的村落、鳞次栉比的茅草屋和屹立的大瓦房,乡村特有的风俗和温馨。因此,柳青的小说不啻是乡村广阔场景的诗意书写,也不仅是乡村群像的粗犷而细致的雕刻,更给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珍贵的乡村画卷。

重读《创业史》,也许有人对于那个年代有点陌生,甚至恍如隔世,但是今天的乡村正是从那个新旧交替、激荡起伏的峥嵘岁月中走来的,而且乡村的振兴与富裕、梦想与现实、困顿与奋斗,在这片广阔天地里任何时候都不过时,都值得作家进行现实而艺术地书写。柳青对于上世纪中期乡村变革的书写,其实映照看今日乡村变革的现在,也昭示着未来乡村的振兴发展。因此,《创业史》于今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,也是对于乡村变革宏大历史的回眸,令我们掩卷之余思虑良久。



《创业史》插图 蔡亮 绘

写给世界的家书

闫文盛

《在人间低处》(济南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)是我对“人间烟火”的触及。我知道自己写了很多年诗,诗歌的力量化为刻骨的印痕进入散文;但从根本的属性来讲,人间烟火仍是我书写的主体。

尽管出现在我笔下的烟火,都片面、局促,仅仅落在了“人间低处”,但它们仍然是无比真实的。我坚信,我已经很多年无法写下这些具象而真实的文字了:由于《主观书》的全面侵入,我的笔下皆是万物空空的幻象,而脱离了这种情绪来写散文的时刻越来越少。在《主观书》之前形成的一类文字(包括《失踪者的旅行》《你往哪里去》《一个人散步》《城市笔记》《光线》《无规则叙事》等各个散文系列,收录于本书《在人间低处》《我身心的部分白发》二辑),可以视之为我的生活自传,它们是无法被空空幻象替换的——因此是“泥泞”的象征物,在很多时候可以为我增饰。《主观书》(包括《一无所是》《痴迷者的迟缓》《灵魂的赞颂》《为燃烧的烈火》《主观书笔记》等八部,迄今约120万字)是心灵自传,这种笔墨更为脱离生活表象,多数都如飞鸟,总是难以落地——我对它充满了太多的自得和欣慰。

两类文字是不一样的。书写它们,是我自2000年以来长达23年的工作。《在人间低处》,是在写生活尘埃;《主观书》则在写思想尘埃。如今深处黎明,我还想说:《在人间低处》是时光源头,对我而言,可谓“万法之变不离其宗”,因此是我愿意拿来作书的题目之用的。我用心地写作这类生活自传12年,一直到2012年终,才拜启《主观书》的写

作。之后11年里,我再未直接地写这类象形于生活的尘埃。《主观书》是空荡荡的,像无根之木,实则不然,它的根便是我所经历的45年尘埃。

总之,无论如何,我将这所有的文字写了下来。将诗歌的根骨作为替代、指针和方向,写入散文。我纵情于这样的书写23年。我在书写中所体会的那些磅礴的力量,延续出了我在写作时的寂静、审慎和时常逾自己我感知的自由——我在此说的是我的越意幻想。《主观书》原有一些笔墨,看似不知所云,但更将蕴藏了我的未来。当然,基于理解方面的障碍,迄今我仍倾向于将它们消隐一些时辰。如今编辑入集的文字,主体并不复杂,但可能极单调;骨肉相连续,但彼此间仍觉孤零零。《在人间低处》不是足够入世,《主观书》也未必绝迹尘烟。我想这或是一种近于真实的状态,它是散文化的,不可完全捕捉,但千头万绪,均有依凭;能够多少意会一些,但所见所思,见仁见智,未必便是作者的初衷。文学是什么?我更倾向于体现性情的千变万化,瞬移之法于此运用,是因为我们在当下,那种自如、自在的写作已经受之于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力而融入了更大的洪流。我着意地写入了这种新力。

整本集子,也是我写给这个世界的家书。当我将“意义”上升及此,我觉得自己想说的,似乎纯出一念,因此它的单调必不可少。但或也因此,它的内在少了一些烟火万状中的杂质,它或许便是那种最真的烟火。至少对我的23年而言,我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。

诗意无处不在

西川

我对“诗意”的看法很宽泛。

我理解的诗意与很多人理解的现成的、陈旧的、不变的、保守的、单向度的、文雅的诗意不同。不光中国古人对诗意有很多现成的说法,仅就中国古人来说,刘勰、钟嵘、陆机、司空图、严羽等,都提出过划时代的看法。这个中,唐代司空图在《二十四诗品》中列举过诗意的各个方面,例如雄浑、冲淡、纤秣、沉着、高古、典雅、洗炼、劲健、绮丽、自然等等。这种归类和划分,塑造了我们的诗歌意识、感受世界和表达自我甚至是表达无我的方式。但我不得不说,在今天,在这样一种社会、历史环境中,它们也限制了我们的文学拓展。

尽管我对古诗诗写并非一无所知,并非毫无感觉,但我不是一个只认古诗诗的人:诗意对我来说,是一种有再生之感的东西。在我看来,有时候,一个残酷的东西里也有诗意,一个破烂的东西里也有诗意,一个丑陋的东西里也有诗意,当然,一个优美的东西,自然会传递出优美的诗意。

批评需要一双慧眼

金汝平

真正审美力敏锐的批评家,往往一眼就洞穿某部作品的优点与局限、某位作家的优点与局限。就像战场上出色的狙击手,往往一枪制敌。

大多数平庸的批评者不着边际,东拉西扯,牵强附会,泛泛而谈。貌似引经据典,实则并无己见。分析一首诗,也要谈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“诗意的栖居”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“在这贫乏的时代里,诗人何为”,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?

这种批评者,就像那些打靶打不到靶子上的人。你打歪了,靶子才是最安全的。的确,慧眼就是慧眼,带着嘲弄,带着无情,也带着善意与同情。真正的高手都有能力犀利地洞察对方、评论对方、揭示对方,如果愿意的话。这也无伤大雅,怕什么?怕什么?每个天才都是在个体才华的有限中闪耀强烈光芒,从而呈现不可忽略的存在。

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与我处于两极。他深深扎根于文学,我扎根于生活。我和博尔赫斯会面将是富有成果的,但被技术性的困难阻碍了。我们“见过”一两次,仅此而已。博尔赫斯已经拥有了一个非常逢迎他的圈子。他讲,他们听。他所说的东西对我来说太过狭隘、太过文学,悖论、妙语、诡辩,一句话,都是我讨厌的东西。他的才智并不使我吃惊。只是到后来,当我读了他真正的艺术作品——他的短篇小说,我才不得不承认,他拥有知识分子异常的颖慧。但“说活的”博尔赫斯,交谈、演讲、采访,还有随笔和文学批评中的博尔赫斯,对我来说总有些肤浅。我时常听到人家引用他“聪明的”名言。嗯,每一次我都感到失望。那什么也不是,只是文学,而且不是最好的。波兰作家兼批评家贡布罗维奇如是尖锐犀利地分析博尔赫斯,也的确击中要害!在这个意义上,我认为东欧作家贡布罗维奇比成群结队的博尔赫斯的拥趸,更了解博尔赫斯。他具备强悍的审美独立性、意志上的独立性,没有迷失在对博尔赫斯的仰望与崇拜中。他的批评之有力,是证明他自己同样强有力的存在。

当然,博尔赫斯仍会冷静而沉静地站在那儿,拄着拐杖,凝视着宇宙的无限迷宫:黄昏的玫瑰、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、拼刀子的好汉、黄金老虎、图书馆、沙之书、草原骑手、圆形废墟和无所不在的夜与昼,无所不在的物质。博尔赫斯承受得住任何批评与质疑、赞美与理解,他作为杰出作家最牢不可破的美学成就,矗立在时间中、空间中,永不坍塌。

一家之言

作家谈艺

经典漫谈

(13)